



STRUC-
TURAL
SLUMPS

结构性萧条

—— 失业、利息和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

[美]爱得蒙德·S.费尔普斯 著

EDMUND S. PHELPS

费剑平 叶虎

译

张培刚

审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结构性萧条

——失业、利息和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

[美] 爱得蒙德·S. 费尔普斯 著

云天德

乔治·卡那吉尼斯 协著者

吉尔菲·佑嘉

费剑平 叶虎 译

张培刚 审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UIBE

0004882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性萧条:失业、利息和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
 (美)费尔普斯(Phelps, E. S.)著;费剑平,叶虎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1

ISBN 7-5017-5089-0

I. 结… II. ①费… ②云… ③费… ④叶… ⑤张…
 III. 衰退(经济) - 研究 IV. F0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811 号

结构性萧条

——失业、利息和资产的现代均衡理论

STRUCTURAL SLUMPS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

[美]爱得蒙德·S. 费尔普斯 著

Edmund S. phelps

云天德 Hian Teck Hoon

乔治·卡那吉尼斯 George Kanaginis 协著

吉尔菲·佑嘉 Gylfi Zoega

费剑平 叶虎 译

张培刚 审校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华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A5 880×1230 印张 1/32 14.125 365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017-5089-0/F·4036

定价:29.60元

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看到我的《结构性萧条》一书能在中国出版。该书从一个完全非货币的观点，研究了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可它与“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文献又有所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活动中现世波动（secular shifts）和长期摆动（long swings）的关注，二是把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看成是失业的根本变化。为了理解这种非静态的波动和摆动，本书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很容易研究永久性结构变化的影响，还可以看出，在调整的过程中，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商业和家庭资产。

促成本书的源动力是西欧大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陷入无法预见的萧条所带来的困扰。本书强调了 1981 年世界真实利率的急剧提高，欧洲工人社会财富（福利救济金、福利津贴等形式）的缓慢增加，以及劳动税率的提高。后来我认识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生产力增长缓慢，虽然在理论框架中对它做了充分阐述，但在整本书中仍强调得不够。许多隐藏在萧条背后的故事，是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都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尽可能地赶上了美国的资本和生产力，因此投资活动在 80 年代有所削减，从而导致就业减少。于是，欧洲几个社会和经济

机构的重负，就不能由 60 年代曾享受的那种特别的投资机会来平衡。

后来看到，这个理论框架也适用于结构性繁荣（根据定义也是暂时性的）。1996 ~ 2000 年投资的激增（在美国最为强劲）就是这种繁荣的典型。理解这种繁荣的关键在于，在这个框架中引入对未来技术进步的瞬时预期，这种预期促进企业增加其对新厂房、主顾和雇员的投资。（瞬时意义上的萧条也可与技术进步的瞬时停滞联系起来。）尽管不能直接观测到这种预期，但真实股票价格和真实汇率看起来可以代表中期投资机会中的商业信心。全面考察这种预期逐渐放大时所导致的后果，则是商业周期理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我深信《结构性萧条》适用于中国和许多（甚或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里的框架可能有助于说明的一个特征是，真实工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几十年间滞后于劳动生产力，随后又趋向于稳定这个差距（若增长速度减慢，则差距缩小）。因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导致的失业上升也与这个框架相一致。但如果要用它刻画当今中国投资和失业的所有重要方面，可能还要在对金融部门的讨论方面有所扩充。

我很感谢张培刚教授对《结构性萧条》一书中的某些思想有浓厚兴趣，并向他今年的 90 华诞表示祝贺。

还十分感谢费剑平博士。甘愿付出艰辛的努力，将这样一本冗长而又技术化的书译成中文。

最后，向中国经济学界的师生表示敬意，你们肩负

的使命颇具挑战性，那就是理解本国经济并投身其进一步发展。

埃德蒙德·S·费尔普斯

纽约

2002年7月22日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see my book *Structural Slumps* published in China. The book is a stud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from an entirely non-monetary point of view. It differs from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literature, though, in focusing on secular shifts and long swings in activity and in viewing changes in the level of activity as primarily changes in unemployment. To understand such non-stationary shifts and swings the book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which one can easily study the effects of permanent structural changes and in which a rich assortment of business assets and household assets are involved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he impetus for the book was the puzzle posed by the unforeseen slump in which continental western Europe fell into in the early 1980s. The book emphasized the sharp elevation of the world real interest rate in 1981, the slow rise of European workers' social wealth in the form of welfare benefits, or entitlements, and the increased tax rates on labor. Later I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nother cause — slower productivity growth — which, while fully present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under-emphasized in the book. The story behind much of the slump was that, generally in the '70s, one European country after another had caught up with U.S.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as much as it could, so investment activity was cut back in the '80s, causing a cutback of employment. The burdensomeness

of several of Europe's so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were then no longer offset by extraordinary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uch as had been enjoyed in the '60s.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later seen to have applications as well to structural booms, which are temporary by definition. The great investment boom of 1996 – 2000, which was strong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radigm case of such a boom.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uch a boom is to introduce into the framework the sudden expectation of a future technical advance that prompts firms to step up their investing in new plant,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Slumps in the temporary sense can be linked to expectations of a temporary pause in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lthough such expectations are not directly observable, real share price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 appear to be serviceable proxies for business confidence in medium-term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what happens when such expectations are seen to have been exaggerated is the next step in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I feel sure that Structural Slumps has applications to China and to many or most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lag of real wages behind labor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decades of most rapid growth, followed by a tendency for the gap to level off (or to narrow if growth slows down), is on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framework here may help to illuminate. The rise of unemployment as labor relocates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ramework. However, perhaps the framework's treatm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will have to be expanded if it is capture all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invest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China today.

I want to thank Professor Peikung Chung for the great interest he took in the ideas set out in Structural Slumps and to congratulate him on reaching his 90th birthday this year.

I am also very grateful to Dr. Jian Ping Fei for his dedication to the demanding task of translating from English so extensive and technical a volume .

Finally, I want to salute China's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economics as they proceed with their challenging mission to understand their nation's economy and to participate in its further evolution .

Edmund S. Phelps

New York City

July 22, 2002 .

译者序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宏观经济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结构主义理论就是其中一个既不属于货币学派又不属于新古典学派的新兴分支，这种现代均衡理论认为，失业率的变化而非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才是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实质；失业的现世波动和长期摆动也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且失业均衡路径的背后，是非货币因素通过非货币机制（如辞职和偷懒倾向、懒散的滞后效应、内部人 - 外部人关系，寻租集团、金融市场资产负债表上的因素和次组织结构等）起作用。但持这种观点的各种思想一直都缺乏一个一致的核心模型，使所有上述机制都能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本书就是 E. S. 费尔普斯教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做出的模型框架，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流范式。本书提供的模型，在解释美国和欧洲的长期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在用战后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计量检验中也有令人满意的表现。

本书的多数模型都是一种建模思路或框架，其中的函数形式和参数都是一般性的，所以在将这些模型应用于解释中国的经验时，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但正

如作者在中文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利用现代均衡理论模型，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多一个视角，并可能得到其他理论不能解释的新颖结论。为此，原著作者十分高兴地为此中文版提写了意味深长的序言。

中国经济学近十年的最大进展莫过于引进了大量的经典教材，但与此同时，对国外最新研究专著的介绍则相当缺乏，可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我们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和吸收其最新的学术成果。本书原著则是一本方法适当、见解独到、富原创性的优秀著作，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认为，出版它的中文版，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和广大师生必有所助益。

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六章由加拿大美菱集团的叶虎先生翻译，其他部分由费剑平完成。最后由费剑平统一全书。叶虎在青少年时代总是在张培刚老先生身边学习，所以文风优雅酣畅并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功底，但由于他没有时间来统一全书，所以最终由费剑平对其原稿进行了调整语气所必须的改动（或许是错误的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老最先看了本书的英文版，认为有一定学术价值，并支持我们把它译成中文（我也希望以此中文版的出版向张老今年90华诞表示衷心祝贺）；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及张卫东、方齐云、张建华、孙鸿敞等教授也始终关注和支持本书的出版；本书编辑张抒文女士在修改定稿的全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校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2年夏，喻园

前 言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现代经济理论,着眼于企业和市场内部由于诸多信息限制所产生的后果,对宏观经济思想产生了解放性的影响。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应运而生,它们既不属于新古典学派,又不属于货币主义学派,而是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因素采取了一种极为不同的视角。萧条和繁荣的本质是失业率的变动,而不是劳动力数量的变动。失业的变动和长期波动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不是形势判断错误或预测失误,并因此成为工资-价格失调的问题。在失业的均衡路径背后,辞职或倾向于偷赖、游手好闲的滞后影响、就业者-失业者关系、福利补贴、寻租集团、金融市场中的资产-债务因素以及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些非货币因素通过非货币机制在起作用。尽管现有的这些思想具有相同的内涵,但还没有提供一个有用的跨时空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个正在兴起之中的学派,还缺乏一个一致的核心模型,以便把上述机理联系起来。

我希望,本书阐述的内容,能成为该学派的主要范式。同从前一样,失业率的均衡路径,总是接近于自然失业率,但又有所不同:自然失业率可以变动!我构建了一系列现代均衡模型,沿着我在1968年提出的思路,自然失业率可被视为经济系统真实结构(和海外对应结构)的一个函数。分析的任务就是要确切地决定,自然失业率如何取决于这一结构:真实部门需求、要素供给和技术、税率、补贴和关税。

当然,理论与实践不是一回事,所以在阐释理论之后,又对决

定失业率的这些因素的实证影响进行了计量研究。如我所见,尽管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使凯恩斯学派和真实商业周期学派的最忠实信徒对我们的理论确信无疑,但这些计量结论都明确无误地支持了这里的范式,并且不支持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即凯恩斯学派和真实商业周期学派)的理论。不过,如果这一研究能引起对就业决定这个主题的重新讨论,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毫无疑问,有关繁荣与萧条的许多问题,依旧是未解之谜。

就从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方法回到真实机制方面来看,此理论与真实商业周期学派相类似。但其对雇员激励和由此而来的对失业问题的现代观点,及其在离散和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对产业的观点,又显然与新古典学派不同。同时,这一新理论,也并不是与凯恩斯学说毫无一致,一个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在一个没有凯恩斯体系之精髓——货币——的理论背景下,我们能多次得到凯恩斯命题。

此外,我觉得有必要简单地谈一谈本书的写作动机,以及它与我和其他人过去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研究萧条呢?在持久不衰的高失业不期而至时,曾经颇受重视的新兴古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诊断出失业产生的原因,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本书和其他有关失业的最新著作才应运而生。暂且避开分析失业理论的困难不论,由于我们对失业的度量大多反映了工作岗位的定量配给(故而是非自愿的),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净负担,所以失业长期居高不下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几个产业内调整价格以使市场出清这一事实(如果是个事实的话)也没有使这个问题有什么根本改变。而且,西方国家也明显难以招架高失业的长期持续,即萧条。战后的繁荣时期,被20世纪70年代遭遇的强劲滑坡所打破。20世纪80年代波及三大洲的不寻常萧条,显然是30年代以来最沉重的一次经济萧条,而对某些国家而言,这第二次世界范围的萧

条比被称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经济衰退历时更长。20世纪90年代已开始又一次经济滑坡,还相当不规则,而且这次萧条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前一次的延续,只是被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所打断。基于如今战后广泛的数据,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失业率能有10年或更长时间的大幅摆动,而且一系列结构变动和发展已将均衡路径推向新的高度。发现这些大幅摆动和过去20年经济局势恶化背后之结构变动的挑战,是开展目前这项研究的推动力。

可以想像,本书仍然尽量用前人的理论去解释最近的萧条。事实上,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有两次认为,在就业决定的货币方法中所迷失的“微观”因素有其恰当的位置,以至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失业波动之主要部分的宏观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后半时期,我们几个人提出了基于预期的工资和就业决定微观经济学,借助于它,我们尽量用失业对均衡(正确预期)稳态水平——即众所周知的自然失业率——的非均衡偏离(非正确预期)来解释就业波动。在70年代后半期,同行们已表现出对那些早期模型的理性预期形式的偏好,我们中有几位试图建立如下思想:以工资设定是随时间缓慢变化的思想作为基础,于是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就业影响也就是持久的了,即向自然失业率的回归很缓慢,而货币稳定政策则能控制向自然失业率复苏的速度。

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都用到了自然失业率。但它是在尚未充分发展时被投入使用的。有关自然失业率的最早论文(比如我那个基于劳动雇员流动的模型),虽触及到自然失业率的形成原因,但没有谈到它的决定。由于疏忽,自然失业率被视为一种常数:虽然能随时间消长,但为方便起见而让它不依赖于通常的宏观经济冲击。在分析中认为,传统的“宏观”冲击对均衡失业路径而言是中性的。

不幸的是,现在看来,这些学派的以一个固定的自然失业率为前提的货币方法,对战后历史中的长期繁荣和两次主要的萧条,难以维系其解释。几年前,在主要是对失业决定的货币方法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在战后20年间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如此地低?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几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失业顽固上涨直至80年代中期,而其他国家却在强劲复苏?凯恩斯学派预测,美国最终采用的财政刺激将拉动欧洲就业,而不是使它进一步下降;顺便提一下,真实商业周期学派也持同一观点。

我认为,要解释战后经济领域的主要就业波动,就必须放弃自然失业率不受非货币“宏观”冲击影响的简化,而支持让均衡失业率成为由一系列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的模型。至少较长期的萧条和繁荣必须主要由均衡失业路径本身的位移,而不是由失业对其不变均衡路径的偏离来解释。这个目标,对我而言,非做不可,因为我不能让宏观经济学界知道,我错过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机会。所以回到自然失业率并意识到它的真正潜在价值就很有必要。

结构变动究竟如何改变自然失业率呢?这一概念挑战已使我们想到并模型化非货币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各种非货币冲击可能对均衡失业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令人快意的是,最终看到,我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企业为努力减少辞职而提高全国工资并导致了失业——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和用于对付偷懒的工资设定这一姊妹概念,可用于这方面的研究。第一个在原一般均衡模型中按设想计算出自然失业率决定的人不是我,而是斯蒂芬·萨洛普(Steven Salop),后来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但他们的模型不够宽泛,特别是有关资产和利息的作用方面,不足以指出有关冲击在比较静态分析中的重要影响。我有

幸及时加入一般均衡研究队伍，并构造了一些模型，解决阻止这一新理论被广泛接受的两个关键性难题。

过去大多数模型都有一个荒谬的含义，如果（如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一个技术进步降低了自然失业率，那么持续存在的长期技术进步会继续降低自然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无趋势的历史证据不符；如果（如在萨洛普模型中）长期的技术进步对自然失业率是中性的，那它就是一个永久性的供给冲击。这里的答案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模型中，尽管自然失业率可能受生产力进步引起的工资和收入上升的影响，但自然失业率的反应完全是瞬时的。这样构造起来的理论，在保全技术冲击和自然资源冲击的短期影响的同时，还避开了长期生产力增长把均衡失业率推向某个趋势的任何含义。

所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劳动市场的需求方从整个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约束中解放出来。我曾经从奥国资本理论的简单说教中得到了大量灵感。几乎所有的就业都受对未来考虑的影响，所以企业对劳动力的支付严重地依赖于真实资产价格，从而取决于真实利率，即使是在忽略有形资本的模型中也如此。这里的几个说明性模型导致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由于某种产品需求实际上降低了利率，所以需求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于是所得到的理论表明，一整套非货币因素——真实需求和供给条件的结构——就能使自然失业率改变。

判断这一理论是否正确尚为时过早。但我相信，在现存理论中，惟有它能表明，全球经济中特定的结构变动和机制，如何能成为近几十年来商业活动中的主要波动和恶化趋势的深层原因。而货币方法和真实商业周期方法则不可能具有相同的解释功效。

尽管我一再努力使这一理论得到应得的重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方法需要它所能得到的一切宣传，但我也要谨防对它宣传过多。如今的经济学看来有一种一元化倾向，认为有一种理论能